

北京四史丛书

流滚滚涛怒七二



北京出版社

北京四史丛书

(5)

二七怒火滚滚流

《北京四史丛书》編輯委员会編
中共长辛店機車車輛工厂委员会选輯

北京出版社
1965年

北京四史丛书(5)二七怒涛滚滚流 《北京四史丛书》编辑委员会编
中共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委员会选辑

北京出版社出版(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)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6号

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: 787×1092 1/32·印张: 4·插页: 2·字数: 74,000

1964年7月第1版 1965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: 60,001—160,000册

统一书号: 10071·736

定价: 0.24元

前 言

最近一个时期,北京市城乡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,编写出一大批家史、村史、社史、厂史以及各种专题史。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,解放前北京地区广大劳动人民,一方面在封建主义、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,饱受残酷的剥削和痛苦的煎熬,有着辛酸苦难的经历;另一方面,他们也从未屈服过,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,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斗争历史。这些史料,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,有着很大的教育作用。

青年一代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,任重道远。青年人只有真正了解老一辈人的苦难经历,经常回忆对比,忆苦思甜,才能不忘过去,永不忘本;才能热爱今天,创建将来。只有真正了解老一辈人光荣的革命传统,才能继承并发扬这种传统,继续艰苦奋斗,肩负起接班人创立共产主义大业的重担。而要达到这个目的,一个十分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,就是充分利用家史、村史、社史和厂史等这些活教材,经常不断地对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。编写家史、村史、社史和厂史是思想教育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。

基于这种認識，我們特从本市家史、村史、社史和厂史中選出一部分，編成《北京四史丛书》，陸續出版，作为北京市的階級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的材料。由于編写者水平所限，加上這項工作在目前还是个新課題，这套丛书缺点与錯誤一定难免。我們热烈地期望广大讀者能把讀后意見告訴我們，以便今后把这套丛书編得好些再好些。

編 者

目 录

我家的血淚史.....	機車車間鉚工 葛文遠(1)
憶父話家史.....	招待所工人 吳艷榮(11)
牢記階級仇,不忘斗爭路	
.....	“二七”退休老工人 孫茂林(21)
斗爭的一生.....	退休老工人 郭景福(39)
走出地獄上天堂	
.....	全國勞動模範、工程師 陳 發(54)
苦海深仇.....	貨車車間木工、生產組長 杜光普(69)
苦難三十年.....	鑄工車間煉鋼工、生產組長 盧增海(83)
父仇子恨.....	鑄工車間翻砂工 李茂林(97)
悲慘的遭遇.....	“二七”退休老工人 馬 祥(113)
后 記.....	(121)

我家的血淚史

機車車間鉚工 葛文遠

杀父之仇

我的老家在山东德平县。父亲名叫葛树贵，他十七岁那年，家乡闹灾荒，穷人没了活路，就用小车推着瞎了眼的奶奶，来到了长辛店。当时我有一个舅爷在大厂做工，父亲投奔他以后，算安了家。舅爷又帮助父亲进了厂，当了小工。

“二七”罢工时，父亲是糾察队副大队长，当时人們都称他“大老葛”。父亲腰里常插着月牙板斧，領着糾察队站崗、截車，沒黑天沒白天地奔跑，凡是大伙的事从来沒有过二话。

他不怕工头，不怕总管，連拿大枪的反动軍隊都不放在眼里。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那天，在火神庙与反动軍警对陣中，他領头向前扑去，身上中了好几枪，还大喊：“伙友們！夺他們的枪啊！”伙友們把他救下来，抬到哪里都沒人敢治，因为伪鉄路局长赵繼賢早就下了命令，不准給罢工的工人治伤。当天夜里，父亲就壮烈牺牲了。当时我人小剛記事，記住的头一件事，就是这个大仇大恨。

家破人亡

父亲一死，丢下我們四个孩子（奶奶由叔叔送回了老家），媽媽給人家縫洗衣服，我和姐姐去拣煤核、挖野菜，靠着地下党和叔叔、大爷們的帮助，过了一陣子。家里交不起房租，房东就拿我們的東西折价，他說算几个錢，就算几个錢。穷人家能有多少家具？很快屋里就空了。不久，房东就把我們撵了出来，媽見实在呆不下去，只好領着我們上了西边的小屯村，投奔了姥姥家。姥姥家房无一間、地无一壠，舅舅給地主扛长活。他把我們安頓在地主家場边的一个小窩棚里。我們想給地主摘豆莢、拿菜虫，混口飯吃。沒想那天，地主帶着几个狗腿子走来，气势汹汹地冲我媽說：“这不是你們呆的地方。”接着把文明棍一揚：“全給我滾！”

我媽是个有志气的人，二話沒說，抱起孩子就走了。上哪儿呢？长辛店不敢去，如果讓官面上知道是罢工的工人家屬，說不定会出事。因此，媽才領着我們上了盧沟桥，找了个大門洞，才算安了家。媽和姐姐給人家洗衣服，我和弟弟挖野菜，有时去杜家坎那儿幫人推洋車。那儿有一个大沙滩，我們幫着把車推过去以后，求坐車的給个小錢儿，可是誰給呀！尽管我們想尽办法掙口飯吃，到头来还是免不了餓肚子，沒法子，只好討飯。

附近有个姓刘的，老两口摆小摊，媽跟姐姐平时待他們很亲热。我們常帮助搬弄些东西，看看摊儿什么的，换几嘴吃的。老两口沒儿沒女，跟我媽商量就把姐姐过繼給他們

了。

一天，媽媽掙來了一碗多米，那是真正的小米，全家都很高兴，媽說：“孩子呀，你們哥儿俩去弄点野菜来，咱們吃两碗小米粥吧。”我們答应着，好像过节似的欢喜，很快弄来了野菜，晚上就做了一鍋粥。这工夫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大群兵。这帮土匪簡直跟餓狼一样，見我們这鍋粥熟了，不容分說，把我媽和弟弟推到一边，眨眼工夫就吃了个淨光。那天我要飯回去时，媽和弟弟哭得跟泪人一样。后来媽說：“哭也沒用，你們长大以后，要长个志气，你們爸爸就是被京汉鉄路的局长赵繼賢和軍閥吳佩孚的大兵打死的……”接着，她就給我們講起了“二七”大罢工的事。这事她講过好几遍，每次講后都一再嘱咐：“长大以后，一定要給你們爸爸报仇哇！”

不几天媽就病倒了。我們見她老不吃东西，以为是嚥不下野菜，就想办法要来了窩窩头、餅子什么的，我們餓了一天，沒舍得吃，拿了一块送到她嘴边說：“媽，吃块饽饽吧。”她把我的手推开，摇摇头。我說：“您吃吧，还有哪。”我們一边哭，一边拿要来的东西給她看。媽睜开了眼皮，大顆大顆的眼泪流下来，她用很弱的声音說：“孩子，媽吃不下去了……不能再跟你們过了……你們要記住，給你們爸爸报仇哇！……”第二天早晨，媽就断了气。

牛馬生活

媽媽死时，正赶上叔叔来盧沟桥，他那时在良乡兵营里

当馬夫,是个好吃懶做的人。他領着我給街坊四邻磕头,有錢人只是搖頭,沒一个理的。好容易湊了几个錢,买了几块木板,釘了个匣子,好歹把母亲埋了。

第二天,叔叔把我們哥儿三个带到了良乡,說是給我們找个活命的地方,可是一連問了好多家,也沒有人要。最后走到离車站不远的王家,留下了老二;到梅花庄的馬家留下了老三;剩下我再也沒人要了。叔叔就帶我上了丰台,挨着店舖打听也沒一家要我的。为什么沒人要我呢?我看了看自己,难怪呀,瘦得只剩了一把骨头,由于討了三年飯,常睡湿地,生了滿身的疥疮,除了一条露屁股的褲衩,什么也沒有。人家要我賠衣裳还不算,将来是死是活也不敢說,十来岁的孩子,长得還沒七八岁的高,人家要我干什么?

眼看快天黑了,叔叔說:“你在这儿等着我,哪儿也别去。”說完就走了,一直也沒回来。天黑了,我餓得实在忍不住,只好各处去要吃,在一家舖子的雨搭子底下过了一夜。我知道叔叔再不会来了,想起长辛店还有个舅爷,就投奔了他家。

十五岁上,我总算找到一份差事,在浴池当了个小伙計,每天飯吃不上几口,却沒少挨打受气。十七八岁了,連一小車煤都拉不动,为什么?滿肚子都是野菜呀!使尽了全身的劲不算,还要抽你的血。

“七七”事变后,日本鬼子侵入南京时,当时我当小杂役。那天,工头讓大伙全去检查身体。到了医院,按順序經過一个个检查室。最后来到一个室里,日本大夫用中国話

說：“你的不要害怕，看看你的血。”接着就用一个很大的注射器，插在我的胳膊上，抽了滿滿一大管子血，我只覺着天旋地轉，头晕眼花，差一点沒暈过去，回去以后真像害了一場大病。

事后我才知道，日本人抽了咱工人的血，是要送到他們軍隊中去，把伤兵救活，再去杀中国人。好毒辣的心！我轉念又一想，既然有伤兵，說明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負的。听人說：“日本話，不用学，过了三年用不着。”看来真有道理。从此，我就想尽法不干活，跟大伙一样，每天給他磨洋工。以后我又听說八路軍打日本，心里就暗暗盼八路軍快打过来。

不久，我被調当錘工。有个外号叫大傻子的日本人，打人打得最凶。一天，平白无故揍我一頓，說我沒干活，因为我的脸不够黑。我这才想起上班后忘了往脸上抹油泥。回去后，实在覺着累，就歇了一天。沒想一上班，又碰上了大傻子，他凶狠地瞪我一眼說：“誰叫你歇工？”順手就抽出一根刚烧紅的鉄棍，沒头沒脑地照我打来，我一时躲閃不开，一下打在脸上，又是疼，又是气。心想：我父母的大仇未报，又来了你們这帮东西，从小挨打受气，长大还受你們欺，豁出去跟你們拼了！正在打愣，大傻子早溜了，就这样，日本人給我留下了一块紀念——左眼下的伤疤。至今每当我照鏡子时，总想起这段事。

日本投降后，我想：这下好了，共产党、八路軍要来了，报仇的日子有指望了。誰知来了一群国民党劫收大員，全

是些攪耙匠，不管工人死活，就知道往自己腰包里攬錢，物價一天三漲，苛捐雜稅數不清。工人甭說拉家帶口，連我這個單身漢的生活，都很难維持。

在大街上，我住的是最小最便宜的房子，為省點燒的，晚上總是一下做出好幾頓飯，星期天還得跟日本統治時期一樣，想辦法出去打個卯子——做個短工，拾點庄稼什么的。難怪人家不願把閨女嫁給工人，咱養不起呀。

我总算走运，二十九岁上，同院伙友給說了个穷人家的閨女，結婚時連床被子都沒有，怎么过呢？拣煤核、拾庄稼、吃糠嚙菜，苦熬苦曳又混了一年多，总算盼到了解放。

姐 弟 团 圓
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，是長辛店解放的日子，這是我們真正當主人的日子，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吃上飽飯的日子，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這一天。

第二年春天，一個星期天，我正在屋裡坐着，忽然院裡有人打听有沒有姓葛的，我忙迎了出去，見來人約摸二十七歲，一身農民打扮，我一面答應着，一面就問：“你是誰？”他說：“我小名叫福生，從小……”我一听是老三，這心立刻就酸了，想不到，這麼些年他還活着。這工夫，他也看出我來了，迎上來說：“你就是大哥吧？”我說：“對，對，哎呀，兄弟，你怎么找來的？”說着趕緊把他讓到屋裡。原來他一直是在人家過苦日子，在那兵慌馬亂的年头，一直沒敢來找我。

靠着伙友們的幫助，第二天，我們又找到离散多年的姐

姐。她見我們還活着，又是悲又是喜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頓。原來姐姐在盧溝橋劉家長大後，嫁給了咱廠一個叫馬榮章的工人，好歹從舊社會熬了過來。說到後來，就短一個老二，聽說他被日本人抓了勞工，去了東北，一走十幾年，沒有音信。姐姐不免又哭了起來。

又過了一年，也就是一九五〇年五月間，老二有信了！有人說他當了解放軍，在北京部隊，捎信來讓我去見面，你說，這叫人多高興！我趕緊去了，喝！老二膀大黑粗，穿着軍裝，挎着沖鋒槍，真帶勁！原來他在東北鏡泊湖那地方，被日本人押着修橋，以後又打短工，受盡人間的罪，好幾次差點喪了命。後來，多虧遇見了一個地下工作者，指給他一條光明大道——參加了解放軍，入了黨，跟着部隊打下了長春、錦州、沈陽，一直打到北京。聽他這麼講，我心里真有說不出的痛快，像老二這樣，才真稱得起是老葛家的後代。臨走我對他說：“兄弟，給爹報仇的事，就指着你啦。”老二笑了笑，說：“國民黨反动派和土豪地主們，跟天下的窮人都結了冤仇，我一個人怎能報仇？得指着共產黨，指着全國人民，打倒蔣介石，解放全中國。把全國人民的大仇报了，咱家的仇也就报了。你說對么？”我說：“對！兄弟，行啊，好好干！”說起來真叫人高興，要不是共產黨，兄弟們這輩子哪兒還見得了面？

黨給我們报了仇

一九五一年六月底，一天，我正在車間干活，黨支部書

記走来,对我說:“老葛呀,你知道吗?‘二七’罢工时的铁路局长,那个大坏蛋赵繼賢被逮住了。”“什么?赵繼賢被逮住了?”“对,現在在郑州,要开控訴大会,你去吧。”“好哇!”我的心咚咚直跳,二十八年啦,这一天可盼到啦!

跟我一起去的还有刘炳波、吳艳荣等几位“二七”工友和烈士家屬,我們一下車就受到了政府有关部門的热情接待,在郑州开了控訴大会,押着这个罪魁祸首遊了街,然后又把他押到了汉口江岸。在江岸,开了公审大会,好多受害烈士家屬控訴了他的罪行。赵繼賢瘦长的駝脸上,长着个雷公嘴,低着秃脑袋,对罪行一一承認,当政府宣判赵繼賢死刑立即枪决的时候,我激动得掉了眼泪,在江岸車站上,我亲眼瞅着枪毙了这个仇人。

不 能 忘 本

一九五二年,党委批准了我的請求,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第二年,工厂在西峯寺、西山坡盖滿了宿舍,我又搬进了第一批盖的老紅房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,我的爱人也进厂参加了工作。我們一共有六个孩子,五个大的都上了学,大閨女都上中学了!要是在旧社会,甯說上学,我拿什么养啊!

一九五一年,我二兄弟参加了中国人民志願軍,在朝鮮立了战功。一九五三年十月复員回来了,分配到咱厂鍛工車間,如今已是个好样的氧气工。他家就住在我东边的宿舍里,大孩子也上了学。我三兄弟,解放后参加了铁路基建

工作,几年来一直在新疆修建铁路,早已入了党,我们常有书信来往。我姐姐也常来串门。逢年过节的,大家带着孩子都要在一起聚会。厂里的领导同志也常来探望,有什么困难,立时就会得到党的关怀和帮助。

在机车车间,我经常干的是车架的轴箱滑动面等活。这活是上工序稍一拖拉,下工序就受影响,自己完不了不要紧,后面多少工序都没法干,这是直接影响修车进度的大事,谁不着急?怎么办呢?我想了个笨法子——加油干!上班前吃饱喝足,睡够觉,早去一会儿把工具准备好,开工就打冲锋,中午吃完饭在家呆不住,进厂更等不了,抄起就干。一回,主任碰见,问我是什么班。我假装着说:“刚来。”其实早干了不少时候了。打夜班时,时常错过吃饭时间。同班几个小伙子,也跟着干开了。我们每人一个砂轮、一台车的滑动面,一撒欢儿就完。就这样,用不了几天工夫,我们就完成了计划,接着,就超过了计划。刚拆的车,一夜工夫,我们的活就干完了。一九六二年,我们小组被评为厂级先进集体。以后,我们一直保持先进单位的荣誉。在小组会上,同志们说我起了骨干带头作用。依我说,这还是刚开始,距离党的要求还差得远呢!

我常想,今天的日子太好啦。可是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。只要咱们跟定党和毛主席,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。可有一样,生活多好,咱们也不能忘记过去的苦,忘了过去的苦,就不知道今天的甜打哪儿来。我们厂盖“二七”纪念馆,每年“二七”开纪念大会是为啥?我想就是为了这

个。在家里,我常搬出我們厂的厂史,讓孩子們讀讀,为的是讓他們看看爷爷、奶奶是怎样死的,好日子是怎样来的?我媽活着时,常嘱咐我:“长大后要长志气,給父亲报仇!”如今,我也常嘱咐孩子們:“长大后,要长志气,要永远不忘本,要永远听党的話,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!”

(郭若楷 整理)

憶父話家史

招待所工人 吳 艷 榮

我是“二七”烈士吳禎的女兒。爸爸鬧罷工犧牲的時候，我才十六歲。吃人的舊社會奪去了我的爸爸、弟弟、妹妹和女兒，這些血海深仇我是永遠也忘不了的。

我七歲的時候，家住在長辛店的高家墳，靠父親在鐵路工廠做工養活一家人。那時，父親還是一個手藝不錯的鑲大轆轤的工匠，一個月只掙十塊半洋錢，一家九口，連最低的生活也維持不了。我每天只得跟着姐姐出去撿煤核，拿回家來燒。那時，吃的全是野菜團子、菜粥，哪見過淨米淨面？什麼酸榴、豬馬尾、刺菜、榆樹葉，只要是能吃的全吃遍了。媽媽怕爸爸累壞身子骨兒，單給他蒸點淨面的窩頭，爸爸也捨不得吃，掰給這個一塊，那個一塊，分完了自己去吃菜餚。為這，媽媽常常和爸爸吵架，媽媽說：“一家大小全靠你掙錢養活，你身子骨累壞了，叫我們怎麼辦呢？”

爸爸說：“孩子跟着我够苦的，成年累月這麼熬，得讓她們吃點好的。”

那時，我們要是吃上一頓烙餅或炸醬面，全家高興得就